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黄遵宪邱逢甲

诗文选译

● 杨胜勇 ●



巴蜀书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黄遵宪邱逢甲
诗文选译

杨 胜 勇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谭晓红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黄遵宪邱逢甲诗文选译

杨胜勇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1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I·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排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凜凜”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惊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的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言

这是一本黄遵宪、邱逢甲二人诗文选译的小册子。之所以把黄、邱二人的诗文选合并编译,是因为他们几乎生活、活动于同一时代,更重要的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均主张文学尤其是诗歌改革,并积极实践,成就显著,时人常把他们并称,被誉为“诗界革命”的巨子。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市)人。光绪二年(二十九岁)参加顺天乡试中举。翌年跟随何如璋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任内介绍中国文化,研究日本文学与历史。出使日本初期,对日本朝野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持鄙夷态度,仍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自光绪五年(1879)与我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王韬结交后,受王韬思想影响,开始接触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思想受极大震动,“心志为之一变”^①,其思想开始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变。这时他不仅

^① 《东海公来简》(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新民丛报》第13号。

从树人方面提出了“师四夷”的思想^①，而且主张学习美国的共和政体，认为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是一个真正的“太平世”。光绪八年(1882)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正值美国资产阶级大规模排斥和虐待华工，黄遵宪以一位外交官的身份极力维护华工权益。美国驱赶虐待华工事件对黄遵宪触动极大，加之后来亲眼目睹美国总统选举的闹剧，美国现实社会中“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政党之横肆”等现象^②，使他原先向往美国共和政体的思想“爽然自失”，其思想进而从“民主共和”又转变到“尊君权，导民权”的君主立宪上。四年后毅然辞职回国，继续撰写在日本时就已开始编写的《日本国志》，希望“借鉴邻国，作匡时之策”^③，即借对日本史的研究，以明治维新为镜子，为清政府寻求君主立宪的治国良方。光绪十六年(1890)跟随薛福成赴英，任驻英使馆二等参赞，此间除从事外交活动和改订其诗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外，曾为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订购设备。光绪十七年(1891)调任新加坡总领事，向清政府奏请采取措施，保护华侨与归侨的正当权益。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他奉调回国，次年被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后参加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出资参加创办《时务报》，聘梁启超为主笔，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于翁同龢的举荐，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员，负责管理全省食盐的生产和运销。并署理湖南按察使，掌管全省的刑狱和官吏考核，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与谭嗣同等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请梁启超为主持，此外还积极参加南学会活动，主讲政教，倡议

① 《人境庐诗草》卷三。

② 《东海公来简》(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新民丛报》第13号。

③ 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

设学校、筹水利、兴商业、劝工业，力谋中国富强独立。次年被任命为三品京堂出使日本大臣，因病未赴任。戊戌政变时，因参与维新而遭弹劾，被罢官回籍闲居，但仍“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①，念念不忘国事，不怕清政府的迫害，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保持密切的书信联系，在给梁启超的信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必须指出的是，在时代已提出推翻清朝腐朽统治任务之时，黄遵宪仍与康、梁一道，固守“君主立宪”的藩篱，坚持保皇，直到1905年病逝。

黄遵宪的一生，经历丰富，其中十多年在国外工作，见闻广博，尽管公务缠身，行旅匆匆，但因自幼嗜诗，见闻经历，多作诗著文以记之，加之注重对中外历史文化的研究，一生不仅留下大量的诗文，而且主张文学尤其是诗歌改革，并且卓有建树。因此黄遵宪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进步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主要作品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等。

黄遵宪以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自命，只是“余事作诗人”^②，甚至“不屑以诗人自居”^③，但诗却是他一生成就最大的方面，以至后来的一些学者和一些辞书在提到黄遵宪时，均只说他是近代著名诗人，而忽视了他其他方面的成就。的确黄遵宪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他的诗，以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虽不屑以诗人自居，但“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④。

① 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

② 黄遵宪诗《支离》，见《人境庐诗草》卷八。

③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④ 黄遵宪《与黄遵楷书》。

黄遵宪因自幼嗜诗,一生中虽公务繁忙,亦从未间断,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篇,只因“四十以前所作诗,多随手散佚”^①,因此现在能见到的应该说只是他所作诗的一部分,黄遵宪现存的诗中,计《人境庐诗草》六百余首,《日本杂事诗》二百首,建国后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搜集整理出版的《人境庐集外诗辑》二百余首(大部分是黄遵宪晚年对《人境庐诗草》定稿时删去的作品,小部分是散见于晚清报刊或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作品)。

黄遵宪的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和鲜明的特色,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黄遵宪诗歌的成就和特色,突出地表现在题材的选取上。一方面,他继承了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选取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政治题材,熔铸为历史性的诗篇,凡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等,都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如在《香港感怀》组诗中,回顾了鸦片战争赔款割地的屈辱历史,看到香港沦为殖民地后成为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的集散地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无比悲愤,“帆樯通万国,壁垒逼三城。虎穴人雄据,鸿沟界未明。传闻哀痛诏,犹洒泪纵横”。诗句充分表现了作者维护主权,反对侵略的鲜明的爱国立场。此外如《羊城感赋》、《由轮舟抵天津作》、《和钟西耘庶常德祥津门感怀诗》和《述怀再呈孺人樵野丈》等都是记录或对一、二次鸦片战争有感而发之作。而《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

^①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歌》、《度辽将军歌》、《台湾行》等十多首诗歌则记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更强烈地表现了作者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高风亮节和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情怀。再如关于戊戌变法的诗歌中,对康、梁发动维新变法、帝党与后党之争、变法失败和后党对维新派的镇压等都作了形象的叙述,并抒发了自己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无比忧虑的真挚感情。据粗略统计,黄遵宪的诗,纪时事或与时事有关的多达五百余首,因此有人称他的诗为“诗史”,实不为过。另一方面,由于黄遵宪有十多年海外工作的特殊经历,对国外事物的了解与同时代其他文人官员相比,见闻更广,接触的新事物更多,观感体会更真切,加之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和倡导诗歌改革,不受传统拘牵,将日本、东南亚和欧美等国的政治、历史、风土人情和近代科学文化融入诗中,这是其诗歌题材的又一突出表现。在这一类诗中,不仅有对日本明治维新、欧美政治制度等社会现实的叙述议论,而且还有对终年积雪的富士山、多雾潮湿的伦敦、南洋椰阴画楼、风和日丽的滨海、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和横跨两洲的苏彝士运河等山川胜迹的描绘。尤为难得的是歌颂西方自然科学的诗,如《今别离》组诗,以轮船、火车、电报、像片等入诗来表现男女别情,令读者耳目一新,被誉为“以旧格调运新理想”的“千古绝作”^①,因此有人说:“近数十年来,能直言眼前事直用眼前物,莫如黄公度遵宪”^②,这的确是同时代其他人所不及的,也是传统诗歌所不能囊括的。也正是他在题材上的突出成就,奠定了他在近代诗坛的地位。

① 何慕翔《岭南诗存》。

② 夏敬观《映庵臆说》。

黄遵宪诗歌的另一特色是在表现手法上极富于形象性。他的诗歌,无论是古诗还是近体诗,叙事状物、刻画人物,形象感都比较强烈。如《赠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瓜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诗人看到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祖国山河破碎,清政府一味屈服,而自己虽有救国之心,却无回天之力,痛心扼腕。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形象地体现在凝重的诗行里,而诗人忧虑无奈的形象也因之深深镌刻于读者脑海之中。黄遵宪的长篇叙事诗尤其富有形象性,在这类作品中,诗人不仅善于写景抒情,如《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登巴黎铁塔》、《苏彝士河》等,更善于直接刻画人物,在他的诗中有备受压迫凄苦不堪的老妇(《邻妇叹》),也有天真活泼的儿童(《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有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爱国将领和威震敌胆、为国捐躯的抗敌英雄(《聂将军歌》、《冯将军歌》等),也有狂妄无知、外强中干的无能之辈和卖国求荣、胆小怯弱的民族丑类(《度辽将军歌》、《降将军歌》等)。诗人在刻画人物时,以典型的情节和生动的语言,或细腻描绘,或简法勾勒,均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黄遵宪诗歌的语言风格也别具一格。主要表现为:一是大胆运用新思想、新名词、新材料入诗,所谓取“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①,像火车、轮船、电报、像片、地球、留学生、赤道、国会等古典诗词中从未有过的新名词,都出现在他的诗中,而且显得自然贴切,不像当时一些新派诗人“喜捃摭新名词以自异”而生硬造作^②。

① 《人境庐诗草》自序。

② 梁启超《人境庐诗草》后序。

一是吸取汉乐府和民歌养料,并运用方言口语,使他的诗歌语言通俗浅显、朴实自然、亲切感人,《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和《山歌》等便是这一特色的具体体现。诚然,黄遵宪的不少作品中喜用典故,特别是近体诗,典故连篇,使不谙典故的读者查不胜查。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作者实践“诗界革命”的不彻底性,是作者残存封建士大夫文化情趣的体现,但这并不影响黄遵宪作为新派诗人的地位,毕竟他在“诗界革命”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并有重大突破,为古典诗歌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由于黄遵宪的诗歌具有以上几个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因此人们对他的诗评价颇高,梁启超称赞“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①,邱逢甲也称其“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界之哥伦布也”^②。近人古直则赞他的诗“旷世独立,绝于等伦”^③。今人曹旭也评价他“每有所作,皆臻绝唱”^④。

黄遵宪的文,除《日本国志》外,还有大量与师友同僚的书信,以及为自己和他人著作所作的序文和一些公文禀批,数量亦是相当可观的。就字数而言,黄遵宪的文远超出他的诗,而论及艺术成就,黄遵宪的文却难与他的诗相提并论,这也是许多人在提及黄遵宪时只知他是一位著名诗人的原因所在。但是,黄遵宪的文章的思想性和史料价值却与他的诗歌有着同等的份量,而由于体裁的不同,他的文在记述事物、阐发思想方面则更为具体详实。

在黄遵宪所有的文当中,最能体现其思想性和文章特色的当

①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② 邱逢甲《人境庐诗草跋》。

③ 古直《黄公度先生诗笺》序。

④ 曹旭《走向世界的诗人》,见《黄遵宪诗选》(代前言)。

属《日本国志》和师友书信中写给梁启超的议论时事、阐述自己思想的信。关于《日本国志》和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及其中所反映的黄遵宪的思想主张,在本书选入的各篇的题解中均有说明,在此不予详述。

邱逢甲(1864—1912)又名秉渊。字仙根,又字吉甫;号蛰仙,又号仲阍,后改号仓海,世称“仓海先生”。台湾省苗栗县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志士、诗人,教育活动家。

邱逢甲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祖父邱学祥、父亲邱龙章都是以诗书起家,而且“锄强扶弱,有任侠风”^①,邱逢甲深受濡染,对他日后影响极深。邱逢甲从小跟随父亲读书,聪颖异常,五岁能属对、吟诗,六岁能文章,十三岁中秀才,而且是全台湾第一名。当时台湾巡抚丁日昌因为邱逢甲年龄最小而交卷最早,让他另作《竹枝词》一百首,一日即成,丁日昌极为惊讶,特赠予他“东宁才子”印一方。

鸦片战争后,中国屡遭列强侵犯,台湾因地理位置特殊倍受侵扰,加之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驻台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大兴洋务,使台湾较多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影响,资本主义因素得到迅速生长和发展。面对新形势、新环境,年轻的邱逢甲力图探索一条强国富民之路。于是潜心西学,“译书素浏览,兼习西事”^②。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台湾首当其冲,年仅二十一岁的邱逢甲,对国家民族命运十分忧虑,对时局的变化发展极为关注,更加留意中外时事和西方文化,“慨然有维新之志”^③。

光绪十五年(1889),邱逢甲赴京参加会试,中进士,授工部虞

① 邱琮《仓海先生邱公逢甲年谱》。

② 邱菽园《挥尘拾遗》。

③ 邱琮《仓海先生邱公逢甲年谱》。

衡习主事,随即因厌弃仕途功名而回籍省亲,此后再不赴任。通过对当时时局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国家富强的当务之急在于兴办教育,传播西方新思潮,唤醒国民,培育有用之才。因此在回台后的几年中,他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主讲于台中府宏文书院、台南府罗山书院、嘉义县崇文书院,既讲应试文艺,兼讲中外史实,劝导学生多读报章“以广见闻”^①。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节节溃败,而沿海防务空虚,邱逢甲见台湾岛孤悬海上,地势要冲,日本人垂涎已久,预料到此次日本人定会恃军事上的全胜而全力来争,于是向台湾巡抚唐景崧请命,愿率士民共同守御,并亲自组织起台湾义军,誓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战斗。而懦弱无能的清政府不思抵抗,反而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凶讯传来,举国大哗,岛内人民更是“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②,邱逢甲悲愤激愤,驰电上书朝廷,慷慨陈词,反对割台。而当看到割台已无法挽回,当即与其他士绅一道倡立“台湾民主国”,国号“永清”,推唐景崧为总统,邱逢甲任副总统。与此同时继续组织、率领义军抗敌保台。但因势孤力薄,节节失利,新竹一战失败后,怀着“孤臣无力可回天”的遗恨^③,于1895年“痛哭辞故国”而内渡,举家定居于粤东镇平山村(今广东焦岭县文福乡澹定村)。

邱逢甲内渡之初,一度迷惘、怅然,曾想过“奉亲且作渔樵隐”,

① 邱琮《仓海先生邱公逢甲年谱》。

② 《小说月报》六卷3号。

③ 《离台诗》。